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 挖掘与传承研究

何红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10YJA850016)

安徽省“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 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

何红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何红艳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50-1665-3

I. ①科… II. ①何… III. ①蒙古族—民族—文学研究—科尔沁地区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032 号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

何红艳 著

责任编辑 权 怡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19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31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665-3

定价:4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图1 科尔沁始祖——哈布图·哈萨尔(1164—?),成吉思汗铁木真胞弟



图2 孝庄文皇后(1613年3月28日—1688年1月27日),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系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的生母,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的祖母

——图片文字来自 360 百科



图3 第二排左三身着蒙古族服装者为科尔沁蒙古族著名说唱艺术大师毛依汗
——图片采自内蒙古日报社数字报(2011年4月19日)



图4 科尔沁杰出艺人琶杰(左)、毛依汗(右)(作者拍摄于扎旗艺术馆)



图5 蒙古族杰出曲艺大师琶杰的亲侄子拉西熬斯尔
于20世纪80年代为牧民演唱(邢宗仁摄)



图 6 盛装的科尔沁妇女们在那达慕会场



图 7 艺人演唱现场



图 8 课题组研究员(左起) 叁布拉诺日布、好比图、诺敏、何红艳



图 9 艺人查干巴拉



图 10 艺人劳斯尔



图 11 艺人扎木苏



图 12 艺人扎拉森



图 13 艺人固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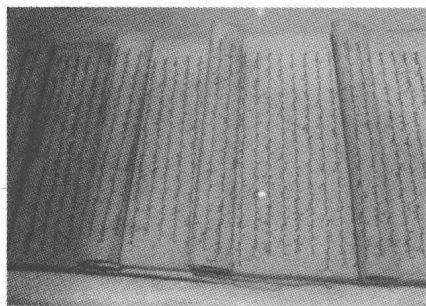


图 14 叙事民歌手抄本



图 15 牧民们在聆听

序

王钟陵

我一向不喜欢给他人包括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当然，如果学生一再请求，顾到师生之谊，我有时也会写，但不会按学生所希望的那样，写上一堆表扬的话。学生称恩师，导师呼贤契，我觉得有些庸俗。好的书稿，自然会以其质量取信于学术界。

何红艳为她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书稿请我写序时，我对她说，我不喜欢写序，但可以为你这部书写一篇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有些话可以说一下。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史，应该是一部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融合有多民族文学的文学史。这是文学史革新的一项重要目标，它的完成还有待时日，因为目前不仅对汉族文学的研究还鲜有具内在逻辑的通贯的理解，而且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还存在大片的空白。

为了培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人才，我于2000年开始，便每年在招收汉族古代文学博士生的同时，也招收少数民族文学博士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我特别关心三个区域：新疆、西藏与内蒙古。当年招收何红艳，是觉得她是内蒙古人，蒙语是她的母语，而她的汉语说、写都很流利，英语也有一定基础。我于是在已经决定为新疆师大培养一名博士生的同时，又额外多要了一个名额。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招收了两个少数民族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前后相承的几个从新疆招来的博士生，我让他们从事于我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而对于何红艳则决定让她从事于科尔沁说唱文学艺术的研究。

王钟陵*：苏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教授，我国著名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中西文化理论研究专家。在全国权威核心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发表数十万字的论文，为学术界所关注，其《新批评竺派竺学理论研究》等系列论文曾获1999年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000年又汇编出版《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库》共10册，其中《二十世纪文学史论文精粹》共5册200余万言，囊括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反映了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概貌，为总结性的世纪工程。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注意它的原生状态，二是注意它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汇状态。我以为，这两点，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特点与价值之所在。

早在1986年，我即提出过革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其中有一项便是整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对历史材料作整体的把握，强调一种对文学和其他种种社会文化因素之伴生关系、因果关系，以及相互激荡融合等关系的认识。我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还说：“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还原回去，从文学与众多其他因素的伴生关系中，从其特定的块团形式中把握那一种浑沦的勃动。”^①少数民族文学活动的研究，更是必须贯彻整体性原则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我们从何红艳的书中可以看出，科尔沁的民歌是如何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并且特别重要的是，因少数民族文学活动具有一种原始性与未分化性，因而，它构成了文学发展的胚胎，有着日后诸种文艺形式分化的胚芽。何红艳的研究表明，科尔沁说唱文学，已经是戏剧与小说成分的综合。说准确一些，应该说它已经内含了发展为戏剧与小说的胚芽。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的中国的《诗经》，离我们已远，我们只知道它是合乐的，应该有相当部分也是有舞蹈的。总体上说，由于它的叙事性不强，估计在当时它并非是说唱文学。汉族文学史已经表明，《诗经》的后续发展是抒情诗与赋。虽然汉族日后产生了众多的地域性的、宗教性的说唱文学，但是它们对汉族小说、戏剧的产生仍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些说唱活动，都已经是在汉族书面文学高度发展以后产生的，所以，我们如要观察原始的说唱活动，则必须到少数民族中去。这正如现代残留的原始部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化石一样。何红艳正是按照我所强调的一定要把田野调查作为研究之基础的要求，深入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地区，作了广泛的调查，写成了这本书。这些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的说唱文学材料，无疑是可贵的。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文学发展的种种胚芽，以及如何从其母体的胚胎中渐次生长的情状。

我颇怀疑，史诗便是一种大型的说唱文学，它是古歌与传说的连缀与改造。如果它的表演成分愈益加重，则原始的戏剧就会日渐成形。希腊戏剧发展得早，应该与此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说唱文学也能成为长篇叙事文学产生的温床。

^① 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无论新疆,还是内蒙古,都并非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新疆地区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多种文化汇流的现象特别突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与汉族、满族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不可能按其原生路径缓慢发展,而必然是在文化渗透、融合乃至文化迁跃中发展。这也是世界各地文学乃至文明发展的一条规律。我们在何红艳的书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2013年6月,我在南昌大学开会,遇到杨增树大校(他参加过20世纪90年代初在辽宁师大召开的文学史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将我于1990年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讲了出来,引起了一场大辩论。以《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为首的相当多的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中国的第一个文学女博士还对我说:王锺陵,你写了《中古诗歌史》,我们认为你建立了一座完美的宫殿,你现在又提出新概念,倒让我们认为你还存在不足了。我回答说,我宁可打碎你们认为我建立了一座完美宫殿的印象,也要提出新概念。杨增树大校在从三清山返回南昌的途中对我说,实践证明你是对的,二十年来,“原生态”概念大行其道。

何红艳此书,正是贯彻“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努力去逼近文学活动原初的发生与生长状态,从而取得了独特的价值。虽然20世纪50年代,国家相关部门曾组织过采集少数民族民歌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与何红艳所从事的工作不同,那只是一个以纪录作品为目的的工作,而何红艳则是依据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立体地研究整体形态的文学艺术活动。因此,我以为,这样的书,目前还是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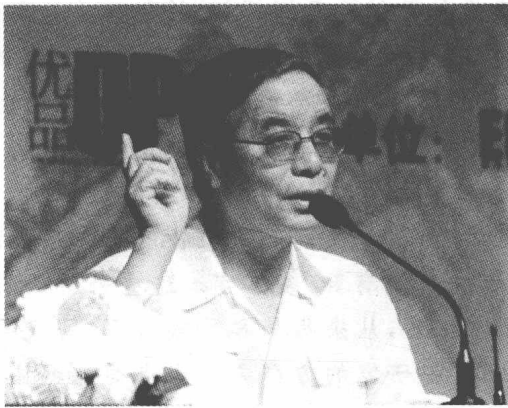
当然,我并非认为何红艳此书就十分成熟了。正如她自己所清醒认识到的那样,该书还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如对科尔沁蒙古族叙述民歌表演、民俗和审美层面的解读,还需要深入和加强,尤其需要对各地表演的差异性进行比较说明;另外,对于艺人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挖掘下去。

值得提到的是,何红艳在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她有如下回忆:“为研究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我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采访了62位民间艺人;为论文的书写准备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翻译整理相关艺人的资料和相关笔记有30多万字。这些采访调研为自己今后的科研拓展了空间。‘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受此启发,我把研究的方向调整为贯彻导师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并接受美国人类学家怀特的文化分层观点和方法。在论文第二稿中我对整个文章布局做了大调整,利用一周时间就写了四万多字,并在

2004年4月25日交上,三天后即收到王先生的反馈信息:修改意见7条。我立刻按照修改意见认真查阅资料进行修改,5月15日上交第三稿;5月20日收到先生的反馈意见:此稿可以,通过。但先生还是给我写下了5条修改意见。从论文初稿到三稿的修订过程中,真实感受到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及对研究问题整体把握的深刻性、新颖性与独创性。这些我将受益终身,也是我未来学习、科研的目标。也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一直延续着我的博士论文相关内容的研究。”除了就论文的修改提意见外,我也对每个学生作次数不等的指导谈话。我查阅了一下,在我的电脑中,就还留存着一段题目为“与何红艳谈叙事诗研究”的录音文件。这些准备工作为她进一步拓展民歌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窗,为此她也一直走在科尔沁民族文学艺术研究的道路上。今天看到她沉甸甸的新作摆在面前,我也为她的坚持而感动,同时也预祝她今后在蒙古族文学艺术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何红艳本人已是硕士生导师,她的科研成绩在同年龄段的高校教师中是比较突出的。我也希望她以已经贯彻于她的书稿中的新的思路继续从事于科尔沁蒙古族文学、文化活动的研究,并逐步拓展到对整个蒙古族文学、文化艺术活动的研究中,这样,她的研究将能够取得独特的价值。在她的专著《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出版之际,我谨以这篇序作为对她的勉励,并寄托我对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及新逻辑学思维方式写成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学史终将问世的遥远的祝福!

2013年11月20日于苏州



王鍾陵教授

序 二

叁布拉诺日布

我与何红艳相识于2000年,当时她在苏州大学读博士。从那时开始每年寒暑假我们都在一起研究探讨科尔沁蒙古族文化艺术等相关问题,经常一起到乡、镇、牧区做田野调查,应该说对她比较了解,她对研究工作的严谨、认真、吃苦的态度令我钦佩。她邀请我为其新作《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作序,我也就欣然答应。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是科尔沁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也是科尔沁蒙古族地域文化艺术中重要的代表,它在2008年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尔沁”一词原系鲜卑语。《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中记述北魏拓跋鲜卑时写道:“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模大真,守门人为可溥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增植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①带仗人“胡洛真”为北魏军事组织中的宫廷侍卫军,12世纪蒙古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军事组织。《蒙古秘史》卷七记载1189年成吉思汗与乃蛮部的塔阳汗进行决战前夕组建怯薛军,令带弓箭人“豁儿臣”与散班、护卫等侍卫军轮流入班执勤。鲜卑带仗人“胡洛真”与蒙古带弓箭人“豁儿臣”均为现代蒙古语“Horcín”之辞源,汉语写成“科尔沁”,意为弓箭手。追踪溯源科尔沁的始祖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这里还是孝庄文皇后、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故乡。科尔沁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倍受关注。无数次的文化勃兴,萨满文化、安代文化、胡仁乌力格尔、叙事民歌等诸如此类的文化形态,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神韵,造就了科尔沁草原文化的崭新时代。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每首都可以叙述出一个真

叁布拉诺日布*:现为内蒙古通辽市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国家一级艺术评论、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内蒙古民俗学会副会长;内蒙古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通辽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① 沈增植,《海日楼札从》卷二,第236页。

实的故事,有的完整,有的则为片段。长篇叙事民歌结构庞大,内容完整,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动人,不仅记录了近现代科尔沁的历史进程,而且大多在深层面触及科尔沁近现代蒙古族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情感世界和精神面貌,应该说是口耳相传的科尔沁近现代社会发展史。如著名的《嘎达梅林》、《达那巴拉》、《那木斯来》、《韩秀英》、《娜布其公主》等。这些叙事长歌旋律婉转动听、主题深刻、情节动人、语言形象,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二,科尔沁叙事民歌的音乐特点为曲调简洁,装饰音较少,旋律线起伏不大,带有鲜明的宣叙性特征;节奏规范多采用单一节拍,曲式多为对称的方整性结构;除大量上、下句乐段结构之外,也有三句、四句、五句乃至更多乐句所构成的复杂曲式;歌词多为四句一段,形成分节歌形式,在不同音韵步上反复迭唱;简单易学,老少皆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题材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科尔沁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英雄歌、情歌、酒歌、婚礼歌、祝寿歌、诙谐曲等歌种。

何红艳博士所著《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挖掘与传承研究》一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基础上,于2010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的专题研究,经过三年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加工,并多次到科尔沁草原各地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反复斟酌而成。这三年的寒暑假,我们基本在收集和翻译资料中度过。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个人的科研活动;既有文艺学的研究,也有文化学、民族学、心理学、美学、宗教学等的研究。该书既着眼于历史文化背景,又着眼于现实传承;既注重民间艺术基础学科的研究,又注重应用学科的研究,使我们对科尔沁民歌艺术的探讨,扩大了范围,拓展的思路,深化了见解。毫无疑问,这对弘扬蒙古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繁荣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理论支持。

科尔沁草原是蒙、汉杂居的地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是蒙古族说唱艺术赖以成熟的温床。一种艺术门类的产生,一种艺术形式的构成与发展,有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及主客观条件。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在发展和流变中,在与同一时空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中,保持了它传统的原生性。在接受中原文化、佛教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时,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并没有失去“自我”,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种亦说亦唱的民间艺术形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科尔沁人,我对科尔沁的文化、风貌、民族艺术及所有相关内容的关注,自不待言。我认识何红艳博士已有十余年,十余年间

她一直刻苦钻研科尔沁文化,并非出于狭隘的冲动,而是有她自己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养和素质,同时她一直努力钻研探索科尔沁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发展轨迹与价值实体之整体图像。这也需要我们这些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者对历史形式的“空白”予以填补,对历史积累的“真实”给予校正,对历史冷落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进行还原挖掘,此也是我们这些研究者的出发点。

这本书对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进行了梳理研究,使我们对科尔沁草原叙事民歌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感到我国各民族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近几年,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推进,也在推动我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文化学等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研究,并为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

奎布拉诺日布

2013年11月16于科尔沁草原书斋

目 录

绪 论	(001)
一、研究意义	(001)
二、研究现状	(004)
三、研究方法	(013)
四、术语解释	(015)
第一章 叙事民歌的文化生态渊源	(016)
第一节 叙事民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016)
第二节 科尔沁蒙古族民族生存发展轨迹	(031)
第三节 科尔沁蒙古族经济形态与叙事民歌形成	(034)
第四节 叙事民歌发展与民族文化认同	(045)
第二章 叙事民歌与民俗融合	(057)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叙事民歌	(061)
第二节 叙事民歌与马文化	(076)
第三节 叙事民歌与婚礼习俗	(081)
第四节 叙事民歌之魂——情歌	(088)
第三章 叙事民歌文体发展轨迹	(096)
第一节 散文体的说唱艺术	(096)
第二节 韵文体的说唱艺术	(108)
第三节 散韵相间的说唱艺术	(119)
第四节 叙事民歌类型与叙事方式	(129)

第四章 叙事民歌的音乐形态研究	(141)
第一节 科尔沁蒙古族音乐概述	(141)
第二节 长调民歌与短调民歌	(147)
第三节 叙事民歌与抒情民歌	(156)
第四节 胡仁乌力格尔与叙事民歌	(159)
第五节 陶力与叙事民歌	(167)
第六节 博文化与叙事民歌	(171)
第七节 好来宝与叙事民歌	(174)
第五章 叙事民歌的文化功能与价值取向	(180)
第一节 叙事民歌的文化功能	(180)
第二节 叙事民歌的历史价值	(186)
第三节 叙事民歌的现代价值	(196)
第四节 叙事民歌的审美价值	(198)
第六章 叙事民歌现代传承与未来发展	(207)
第一节 叙事民歌的现代传承方式	(207)
第二节 叙事民歌传承现状与困境	(218)
第三节 叙事民歌传承模式探析	(224)
第四节 新媒体与科尔沁叙事民歌传播	(238)
附录 田野调查	(244)
一、科尔沁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异文整理	(244)
二、科尔沁民歌收集整理调查报告	(252)
三、扎鲁特旗民歌调查报告	(260)
四、2012 年“纪念曲艺大师琶杰 100 周年诞辰大会”纪实	(263)
参考文献	(280)
后 记	(286)

绪 论

蒙古族叙事民歌始见于元代,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诞生与发展传承于蒙古族叙事民歌。2008年6月7日,科尔沁叙事民歌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类重点保护和继承、发展的文化艺术类型。蒙古族传统叙事民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这不仅与蒙古族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国家体制和民间艺术形式有关,也是由叙事民歌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决定的。

一、研究意义

叙事民歌,也称为故事民歌,是有人物、故事情节的民歌。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它还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发展演绎出来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

从根本意义上讲,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派生物,同时也是文化的突出体现。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文学艺术,都与本地域、本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群体性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参考笔者的导师王锺陵先生提出的“原生态把握方式”和美国人类学家 L. A. 怀特的文化分层观念和方法,但在具体运用中也略作改动。原因之一是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只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之二是科尔沁叙事民歌这个文化体系是由诸多层面的文化因子组成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不断吸纳、融合和变异的过程。因此,本书就是抓住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多元性这个普遍性特点,分析和从中找出它的特殊性、规律性,以探寻叙事民歌的文化渊源。王锺陵先生的研究方法对本书所做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他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使笔者思维更加缜密,考虑更加全面。

“科尔沁”一词原系鲜卑语。最早见于《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中,其记述北魏拓跋鲜卑时写道:“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